

〔美〕科林·埃文斯 著 毕小青 译

法医学之父

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
具有开创性的案例
以及现代犯罪现场调查的开始

The Groundbreaking Cases of Sir Bernard Spilsbu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CSI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人探索事实真相的雄心而开始发生变化

这个人就是
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

山东人民出版社

[美]科林·埃文斯 著

毕小青 译

法医学之父

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

具有开创性的案例以及现代犯罪现场调查的开始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医学之父/ (美) 埃文斯著; 毕小青译.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209 - 04936 - 8

I. 法… II. ①埃…②毕… III. 斯皮尔斯伯里(1877 ~ 1947) …传记
IV. K837. 1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139 号

THE FATHER OF FORENSICS: THE GROUNDBREAKING CASES OF SIR BERNARD
SPILSBU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CSI by COLIN EVANS.

Copyright © 2006 by COLIN EVA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NEW ENGLAND PUBLISHING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8-097

责任编辑: 麻素光

封面设计: 李海峰

法医学之父

——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具有开创性的案例
以及现代犯罪现场调查的开始

(美) 科林·埃文斯 著 毕小青 译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32 开(150mm × 228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48 千字 插页 2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ISBN 978 - 7 - 209 - 04936 - 8

定 价 3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0539) 2925659

ACKNOWLEDGMENTS

鸣 谢

我要感谢英国护照办公室的金·麦卡恩,苏格兰场档案馆馆长雷·西尔,格雷戈·曼宁,戴维·安德森以及大英图书馆、英国报纸图书馆和公共记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特别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埃德·纳普曼以及新英格兰出版经纪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本书从开始创作到最终定稿的整个过程都是在萨曼莎·曼多尔优雅的编辑之手的指导下完成的;我要感谢国家司法证据科学研究所的贾勒特·霍尔考克斯和埃米·韦尔什为本书提供序言。我还要感谢桑迪·苏的出色技术编辑工作。不用说,虽然以上提到的所有人士对本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书中的任何错误和疏漏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

最后,我要对那些不知疲倦并且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特约记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天都向我源源不断地提供以优美的语言所讲述的、有关构成本书支柱的那些案件的各种故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有关这个令人神往的时代的知识无疑会变得大为逊色。

序

在这个时代,我们正受到司法证据科学的进展和刑事调查高科技世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如今的社会已被先进的技术所吞没,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个尚未出现这些技术的年代。而我们这两个被毫无头绪地推入这一领域中的人也忘记了,司法证据学曾经有过如此卑微的初始阶段。如果没有当年那些真正的现代司法证据学先锋,我们现在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

自从该隐决定结束他的兄弟亚伯的生命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为各种谋杀行为所困扰。而世纪之交的英国社会也不例外。各种令人发指的暴力犯罪层出不穷,除非凶手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恰好被执法者撞了个正着,否则这些案件大多数都无法破获。在那时,犯罪现场调查只不过是停尸房中尸体的一张粗陋的照片或者对案发地点的一次匆忙的查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很幸运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人探索事实真相的雄心而开始发生变化。这个人就是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

《法医学之父》这本书为我们详尽地讲述了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司法病理学家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引人入胜的故事。作者把我们带回到了斯皮尔斯伯里所在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他传奇的人生以及他所调查过的一些最著名的案件——从他所勘验的第一具被埋藏的尸体,到他的最后一次出庭作证。在本书中,斯皮尔斯伯里的人生经历与真实的案

例交织融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在司法证据科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经典的谋杀案侦破故事。

如今的犯罪现场调查人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去全国司法证据学院这样的地方去学习调查艺术之外的科学知识。而斯皮尔斯伯里则没有这种优越的条件。他必须依靠自己,不断创新,在犯罪现场调查领域引入了革命性的科学研究概念,从而为未来的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奠定了工作基础,并且为司法证据科学世界留下了一份不可估量的遗产。

《法医学之父》是犯罪现场调查人员以及那些希望从事犯罪现场调查工作的人所必读的一本书。

贾勒特·霍尔考克斯和埃米·韦尔什
国家司法证据科学研究所

导 言

随着 20 世纪的到来,司法证据科学在欧洲最终进入了成熟阶段。在法医学领域内真正令人惊叹的进步面前,公众以及司法界对司法证据科学所持的长达几十年的怀疑态度终于土崩瓦解。在这方面首当其冲的是法国:两位犯罪学领域的巨人——来自巴黎的奥古斯特·昂布鲁瓦兹·塔迪厄和来自里昂大学的更为著名的亚历山大·拉卡萨聂教授——对惊慌失措的法国黑社会发动了一系列重拳出击。他们共同提倡通过犯罪实验室推动刑事侦查工作,从而使监狱中关满了罪犯,断头台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并使犯罪分子闻风丧胆。此后不久,在 1879 年,巴黎警察局一位负责统计工作的文员阿尔封兹·贝蒂隆为刑事侦查工作提供了一个威力强大的新武器。通过数年的研究,他产生了一个信念:世界上不存在具有完全相同的体貌特征的两个人——即便同卵双胞胎也不例外。他将这一信念提炼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集成典的人类鉴别体系。建立在数百个严谨、准确的人体测量数据基础之上的人体测量法(它后来也被称为“贝蒂隆人体鉴别法”)在抓捕罪犯方面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方法,其发明者也因此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直到 1894 年他灾难性地介入了德莱弗斯

案,从而使自己名声扫地。*

贝蒂隆所犯的这一可怕的错误只不过被看做是法国司法证据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挫折。在法国的带领下,其他国家也取得了进展。在德国,科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即将揭开 ABO 血型系统的秘密,他后来因为这一发现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的同胞保尔·乌冷呼特所发明的建立在兔子血清基础上的沉淀素测试最终提供了一个明确区别人血和其他动物血液的方法。考虑到血液和血迹在暴力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两项重要的进展后来在打击犯罪方面起到了全球性的影响。在德国其他地方,科学家们正在使用显微照相术探测使用过的子弹上面的微小痕迹和条纹,从而为现代弹道分析奠定了基础。

在奥地利,由于司法证据科学早期曾遭受了一些挫折,维也纳的埃杜瓦尔德·冯·霍夫曼教授在 1875 年单枪匹马地发动了一场战役,其目的就是恢复这门科学在其祖国的名声。1893 年他得到了来自其同胞汉斯·格罗斯的帮助。格罗斯是一名在社会工程方面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的治安法官,但是他有着杰出的分析头脑。他所出版的《刑事调查制度》(System der Kriminalistik)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刑事侦查学这一学科的著作。在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中,格罗斯为至今仍然被使用着的正确的证据处理程序奠定了基础。

似乎在整个欧洲,实验室正在对犯罪分子撒下天罗地网,使他们越来越无处逃遁。但是仍然有一个国家尚未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

英国当时正处于一个司法证据科学的精神分裂症发作时期。具有独立法典的苏格兰长期以来一直享有以大学为基础、由邓肯和利特尔约翰等家族领导、可以与欧洲大陆分庭抗礼的优秀司法证据学传统。与之相

* 在该案中,贝蒂隆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在法庭上作证说,被送到德国军方的一封叛国信出自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之手。尽管许多专家证人都做出了相反的证言,但是贝蒂隆还是占了上风。结果德莱弗斯在魔鬼岛上被关押了 12 年,直到真正的叛徒费迪南·沃尔辛·埃斯特哈齐最终被揭露。

比,英格兰则仍然深陷在中世纪的泥潭之中。在“约翰牛”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潜藏着一种对作为与犯罪作斗争的工具的实验室本能的反感。人们的冷漠态度只是这一落后状态的一小部分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一连串令人瞩目的刑事案件所引发的对司法证据专家的强烈怀疑。在这些案件中,出庭作证的医学专家出于各种原因最终都陷入了狼狈的境地。其中最为怪异的一个例子来自 1859 年对托马斯·斯梅瑟斯特医生的审判。在该案中,斯梅瑟斯特被指控毒杀了他的重婚“妻子”伊萨贝拉·班克斯。斯梅瑟斯特坚持说班克斯死于胃病并发症,而当时最伟大的毒物学家阿瑟·斯温姆·泰勒教授却声称,他在班克斯小姐的尸体样本中探测到了砒。泰勒一走上证人席就明显面临着危机。他神情慌乱,时而大声威吓,时而支吾搪塞,竭力掩盖自己实验方法中的漏洞。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陪审团仅仅因为他的显赫名声而采信了他的证言,结果斯梅瑟斯特被判处死刑。

这一审判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场风波中,最响亮、最具火药味的声音来自存在巨大意见分歧的医学界。一份著名的杂志对泰勒的行为感到如此愤慨,以至于大声疾呼:“我们现在不得不认为:泰勒教授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他应该立即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隐退到其私人生活之中,并且在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上他最喜欢的砒铜。”^①(这个希望落了空。1865 年《泰勒法医学原则与实践》出版并取得巨大成功,此后这本书历经不同编辑的编辑加工,连续出版了一个多世纪。)这个案件所引发的巨大的喧嚣声迫使内政部采取了行动,英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本杰明·科林斯·布罗迪爵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在他的建议下,斯梅瑟斯特得到赦免并被释放(但是他后来被判定犯有重婚罪,并因此而坐了 12 个月的牢)。在公众的眼中,司法证据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严重瑕疵的产品——而所有陪审团都是从公众中挑选出来的。

^① *Crimes and Punishment*, vol. 14 (Paulton, England: Phoebus, 1974), 130.

尴尬并没有就此结束。对两名外国女人的审判结果也使公众大倒胃口。这两个女人一个是来自法国的阿德莱娜·巴特利特,另一个是来自美国的弗洛伦斯·梅布雷克。她们都被指控毒杀了自己的丈夫。在对巴特利特的审判中,没有人怀疑被告的丈夫爱德文·巴特利特是因吞咽大量氯仿而死的——他的胃中装满了这种化学药品。但氯仿是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液体,凶手究竟是如何做到将如此大量的氯仿灌入被害人的口中而又使被害人不大声尖叫的呢(房间中的其他人并没有听到声音)?专家们就这个问题在法庭上争论不休,而巴特利特夫人则得益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困惑,她被无罪释放。在3年之后,也就是1889年受审的梅布雷克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在该案中也存在大量同样是相互矛盾的专家证言,实际上,人们从来就没有弄清楚究竟控方所声称的被害人詹姆士·梅布雷克是死于砷中毒还是死于自然原因,但弗洛伦斯却被判处绞刑。她直到即将被送上绞架的前几天才得到缓刑令并被改判为终身监禁。

这些矛盾的判决更加深了人们对医生和试管的偏见。但奇怪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愚蠢的医学错误层出不穷的时代,英格兰却出现了19世纪司法证据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发展——有关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具有相同指纹的发现。即使是这样一个本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重大胜利的发现也陷入了令人头脑麻木的困惑之中。尽管远在阿根廷的警察当局在1892年就已经通过指纹证据而获得对谋杀犯的定罪了,但是早在1858年就开始使用指纹的英格兰却在世纪之交仍然为这种新技术而痛苦挣扎。多年来,在两个医学杂志之间一直进行着一场缺乏尊严的“指纹之争”。实际上这是两场争论:第一场争论是在威廉·赫谢尔与亨利·福尔兹之间发生的有关“指纹技术之父”称号之争(在这场不光彩的争论中,双方难分胜负,最后闹得两败俱伤)。第二场是有关指纹技术是否先进和准确到可以取代贝蒂隆人体鉴别法而成为主要刑事鉴别方法的争论。这一争论不像前一个争论那么充满仇恨,但是却远比它重要。死硬派人体测量学家

仍然希望自己最终能够赢得胜利,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正在逐渐削弱。越来越多的重量级人物站到了敌对方的阵地上,而其中最重量级的一个人物就是弗朗西斯·高尔顿,一位性格古怪的绅士科学家。他最初曾经尝试将指纹技术划分到一种可使用的系统之中,后来又抛弃了贝蒂隆人体鉴别法。他写道:“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有关这种方法的介绍缺乏充实性,而那个声称建立在大量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准确性的原则明显是错误的。”^①英国陪审团在这方面所感到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既然那些所谓的专家都无法就科学问题达成共识,那么更何况他们这些外行呢?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将改变。1899年10月2日,一位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20岁的学生来到了位于伦敦市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附属医学院,并向招生人员做了自我介绍。他外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高超过6英尺,穿着考究,有着一种令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傲慢的贵族举止。但是在他显然并不优秀的学术背景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预示他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当时有人预言说,这个内向的年轻人在10年之后将会成为一个能够侦破那些为一般的凡人所无法理解的恶魔般的案件、拥有几乎是超自然的推理天赋、具有现实生活中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地位的英雄的话,那么他在牛津大学的伙伴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可笑。

他不仅是第一位伟大的犯罪现场调查员——那些如今频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穿着白大褂的神秘莫测的人物的鼻祖,而且还是专家证人这一角色的发明者。在诸如迈克尔·巴登、赫伯特·迈克唐奈、李昌钰和西里尔·韦克特这些司法证据学领域的当代的杰出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找到他的踪迹。通过一系列使他的欧洲前辈们相形见绌、在真实世界中令人震惊的成功案例,他仅凭一己之力就将法医学从停尸房搬到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当他的同行们坐在可以预测的实验室中享受着舒适的工作环境

^① Francis Galton, *Memories of My Life* (London: Methuen, 1908), 251.

的时候,他却在泥泞田野中摸爬滚打,在冰冷的水中长久站立,在呼啸的暴风雪中踉跄行走,皱着鼻子在散发着恶臭的尸体上做着各种检查。为了揭开死亡的秘密,他愿意前往任何地方,忍受任何艰难困苦。作为对他的这种努力的回报,充满感激之情的英国人民将他的地位提升到了国家偶像的高度,把他看做历史上最著名、最伟大的法医学专家。他的名字就是伯纳德·亨利·斯皮尔斯伯里。

目 录

CONTENTS

1	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初露锋芒
28	第二章 战争中的病理学家
61	第三章 索霍的屠夫
88	第四章 杂草中的砒霜
117	第五章 人体拼图
148	第六章 自杀还是他杀
181	第七章 受到围攻
215	第八章 几乎完美的谋杀
245	第九章 装着尸体的行李箱
275	第十章 黑暗的十年
310	后 记

第一章

初露锋芒

1910年7月的一个阴冷的上午,两名男子穿过伦敦新牛津街上拥挤的人群,来到了阿尔比恩大厦前面。这两个人的体格和举止透露出长期从事警察工作的人所特有的那种让人略感畏惧的权威。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们是警察。这两位神情严肃的男子核对了一下那座大楼的地址,然后走了进去。在楼内墙上所贴的一个机构指南的引导下,他们来到了一处由两位美国人开设的、名为“耶鲁齿科专家”的牙医诊所。进入诊所之后,那位年龄稍长、个子较高的来访者自我介绍说,他是苏格兰场的首席审查官沃尔特·迪尤。他要找这个诊所的合伙人之一霍利·哈维·克里平谈话。

当克里平出现的时候,迪尤和他的助手阿瑟·米切尔的脸上都没有显示出一丝表情,但暗地里他们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人。有关克里平的丑闻性的指控暗示,他应该是一个像意大利冒险作家卡萨诺瓦一样的风流浪子。但是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来自密歇根的48岁的克里平却是一个头部谢顶,留着可笑的海象式胡子,长着一双从金边眼镜里向外张望的浮肿、昏花的近视眼的矮个子小男人。但是进一步观察改变了他们对克里平的第一印象:他矫揉造作的外表远远补偿了他在体貌方面的缺陷。他穿着花哨的衣服,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只热带鹦鹉:双排扣宽下摆的

礼服大衣、淡黄色的领带、海军蓝的衬衣、漆皮皮鞋。除此之外，他还有着一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悠然自得、和蔼可亲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爱德华时代拘谨的英国社会中并不多见，因此很容易解除人们的戒备之心。

但是直觉告诉迪尤必须保持警惕。通过背景调查，他知道克里平喜欢以“大夫”自称，但实际上他在医学方面仅具有一些皮毛的知识；自从1897年来到伦敦之后，他一直靠以邮购的方式卖假药勉强度日。据说克里平在经济方面是个冒险家。来自各方面的消息都显示，他现在正面临着被一场债务海啸所吞没的危险。

迪尤说明了他的来意。克里平的妻子是一个外表邈遏、事业上极为失败，但却陶醉于自己艺名——贝尔·埃尔摩尔——的杂耍歌手。最近她的朋友与苏格兰场取得了联系，因为他们对她的神秘失踪感到非常担心。在1月底到现在的5个月中，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最初克里平安慰他们说，她已经回到了她的家乡美国。然后在3月份，克里平眼含着泪水，用哽咽的声音告诉了他们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噩耗：贝尔已经死于双重胸膜肺炎。听到这个消息后，贝尔的朋友最初的反应是震惊和难以置信。但是当得知克里平刚刚丧妻就将一个小自己20岁的女人带回家中的时候，他们都感到气愤不已，并且开始对克里平所讲的故事产生了怀疑。在那个年代，人们远不如今天这么宽容。克里平的打字员埃塞尔·勒尼夫摇身一变就成为他的姘妇，其速度之快让他们无法接受。更让他们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她还经常厚颜无耻地穿戴着那个失踪女人的首饰和毛皮衣服到处炫耀。

当迪尤以枯燥的语调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克里平不安地挪动着身体。他沉默了一段时间，似乎正在衡量摆在自己面前的各种选择，然后叹了口气说道：“我想最好还是跟你说实话。”迪尤严肃地点了点头。克里平继续说道：“我所讲述的有关我妻子去世的消息是假

的。据我所知，她目前还活着。”^①他坦白说，他所编造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烟幕弹，其目的是掩盖一个令自己感到十分尴尬的丑闻：他的妻子是一个酒鬼，并且在他们麻烦不断的婚姻关系中一直在与别的男人通奸。这次她与她的最后一个情人一名前职业拳击手私奔到了芝加哥。

迪尤认真地倾听着克里平所讲述的这个漫长而又俗丽的家庭传奇故事。长期被老婆戴绿帽子的克里平因为懦弱而不敢承认事实——这听起来非常可信。迪尤后来承认，他当时对于这个满脸羞愧、站在自己面前不安地挪动着身体的小男人充满了同情。即使贝尔最亲密的朋友也承认，贝尔在喝醉酒之后，她的舌头会变得像水母一样恶毒，而她几乎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她恶毒的言语主要是由事业上的挫折所引起的——无数次失败的面试是会对一个人的灵魂产生这样的影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把怒火发泄到了她那可怜的像虾米一样缩头缩尾的丈夫身上，尤其是她的丈夫在经过多年默默的忍受之后终于奋起反抗，开始了自己的一段婚外恋情。

尽管对克里平非常同情，但迪尤仍然是一个头脑冷静的警察。他严厉地警告克里平，今后不许再向他人重复这种愚蠢的谎言。羞愧而又悔恨的克里平低声下气地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愚蠢的。讯问在非常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了。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共进了一顿午餐，很显然克里平在享用他的那份牛排的时候胃口极佳。然后迪尤和克里平一起来到了后者位于西尔德洛普月牙街 39 号的住宅，那是位于卡姆登的一座毫无特色的别墅。迪尤在这所房子的各个房间和柜子里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于是就离开了。在临走时他警告克里平说，这个案子只有在贝尔的下落得到证实之后才算了结。但是私下里他并没有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也并不太在意。这个案件明显是一场家庭风波，虽然对当事人来说是一场悲剧，但并不是警察所关心的事情。迪尤在脑子里将这个案子

^①Tom Cullen, *Crippen: The Mild Murderer* (London: Penguin, 1977), 121.

放进了贴有“浪费时间”这一标签的档案柜中，然后就回到了苏格兰场。

嫌疑人潜逃

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10日，这位首席审查官遇到了其职业生涯中最让他感到震惊的事情：那天他来到西尔德洛普月牙街39号，想和克里平澄清一些事情，结果却发现那里已是人去楼空，只剩下了一个克里平在前不久才雇用的法国女仆。这个女仆看上去非常激动，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解释说，房子的主人在前一天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并且他把埃塞尔也带走了。

迪尤怒发冲冠。毫无疑问，他被骗了。克里平肯定是出于害怕才逃跑的。但是他到底怕的是什么呢？迪尤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发现了几个被遗弃在那里的、装了一半衣服和物品的行李箱，这表明克里平在走的时候是多么的惊慌和匆忙。迪尤的直觉在向他大声疾呼：贝尔失踪的秘密就隐藏在这座三层楼的房子的某个地方——这所房子丑陋的粉红色装潢和俗气的窗帘使它看上去更像是一所妓院而不像是一个住家。迪尤挽起袖子，抓起一把铁锹，开始在后院挖了起来。同时，他下达命令，对这所房子进行彻底搜查，如果必要的话，每一块砖头都不能放过。

那时正值闷热的夏天。搜查人员挥汗如雨地在这所房子中整整干了两个整天，结果却一无所获。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或者任何可以揭示克里平匆忙逃跑的原因的线索。

在第三天，已经筋疲力尽并接近放弃的迪尤回到了那所房子中，打算最后看一下位于前门台阶下面的煤窖。突然，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铺在地上的一块石板似乎有些松动。他拿起一根撬铁，撬起了那块石板。一股无疑是腐尸的气息从地下冒了出来。迪尤立刻大声命令警察开始挖掘。在挖到地下8英寸的地方，他们的铁锹铲到了一些柔软、油腻的东西。一股扑鼻而来的恶臭使警察们纷纷扔下铁锹，朝着出口的方向逃窜。